

宋代四川城市体系变迁及空间分布研究

李映涛

【摘要】宋代是四川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城市数量较隋唐五代时期有较大减少，更趋近于今日之城市数量，亦或可以从侧面反映其相对合理性。受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宋代四川城市的发展分布仍呈现出均衡性。这也可从宋代四川城市等级规模体系以及重要商业经济中心城市的分布格局中得以反映。

【关键词】宋代 四川 城市等级 分布格局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11-0046-n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大转折”¹城市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城市商业的繁荣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城市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城市封闭式城市制度”²“城市规模普遍增大”³城市体系与城市分布也进一步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宋代四川城市的发展变迁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以及人文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宋代四川城市的发展又具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

“宋代的四川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⁴宋代四川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四川城市体系和城市分布格局的变迁，初步奠定了四川地区后世城市体系和城市分布格局的框架，其影响延续至今。本文希望通过对宋代四川城市数量、分布格局、等级规模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进一步探讨宋代四川城市发展特点及其在宋代四川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同时，对宋代四川城市体系变迁及空间分布格局的探讨亦或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宋代中国城市发展变迁的认识。

一、城市数量与分布

（一）城市数量的变迁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统计，宋代四川地区共设有 49 州，179 县。宋代四川地区州县设置较隋唐五代时期有较大减少，究其原因，应该主要与宋神宗时期全国大规模地省并州县有关。熙宁年间，宋神宗针对冗官冗员过多，人民徭役繁重的局面，决心进行改革，减少冗员。大量省并天下州县，以裁撤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正是这项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记有“熙宁元年五月戊戌，废庆成军为荣河军使，隶河中。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聚一方，多置军县以固疆域，由是役繁民困。其议省并之。’”⁵因此，裁撤的主要依据，还是该州县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户口多寡。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口较为稀少的州县就自然成为了裁撤的对象。在四川地区，一些在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在一些本身开发程度并不高的地区所设置的州县也就多被裁撤。从这个角度看，宋代四川地区州县城市的设置应该比之隋唐五代时期更能反映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行政区划的合理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下为根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对宋代四川地区州县城市设置情况所做的一个粗略统计。

¹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学科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李映涛，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1。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75 页，第 275 页，第 28 页。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第 4 页。

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00 页。

表 5-1:宋代四川州县城市建置统计表

	州（府、军 监）名	辖县数	州（府、军 监）名	辖县数	州（府、军 监）名	辖县数
成都府路	成都府（益州）	9	眉州	4	崇庆府（蜀州）	5
	彭州	4	绵州	5	汉州	4
	嘉定府（嘉州）	5	邛州	6	简州	2
	黎州	1	雅州	5	茂州	2
	威州	2	永康军	2	仙井监	4
	石泉军	3				
潼川府路	潼川府（梓州）	10	遂宁府（遂州）	5	顺庆府（果州）	3
	资州	4	普州	3	昌州	3
	叙州	4	泸州	3	长宁军	1
	合州	5	荣州	4	渠州	3
	怀安军	2	广安军	4	富顺监	

(二) 城市的区域分布

从上表可知，宋代时期，四川共设置有 49 州，179 县。其中，成都府路有 16 州，63 县；潼川府路有 15 州，54 县；利州路有 6 州，30 县；夔州路有 12 州，32 县。从各路拥有城市数量上看，各路城市数量存在差异，从数量上看，成都府路为第一，潼川府路为第二，夔州路为第三，利州路为第四。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所拥有的城市数量明显高于利州路和夔州路。

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许更能清晰地反映出宋代四川城市的分布状况。

表 5-2:宋代四川城市分布密度表

路名	面积 (km ²)	县数	城市平均覆盖面积 (km ²)	密度次序
成都府路	54,818.37	63	870.13	1
潼川府路	55,092.83	54	1020.24	2
利州路	79,516.07	30	2650.54	3
夔州路	107,310.88	32	3353.47	4

资料来源：1、各路的面积采自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64 页。

2、各路县数根据《宋史》卷 89《地理志》⁵统计。由于本表中所采用的各路面积为宋代川陕四路面积，包含了本文所界定的四川地区疆域范围之外的地区，因此在本表中的县数统计中也是采用宋代川陕四路范围内所有的县级城市数目。

从上表可见，宋代四川城市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地区间不平衡性。地处川西平原的成都府路是城市分布密度最大，且连续分布最广的地区。地处川中南的潼川府路的城市分布也较为广泛。上述两路面积仅为四川地区总面积的 37.04%，然其所有城市数却占宋代四川地区城市总量的 65.36%。与之相反，位于川东地区的夔州路的城市分布密度却极低，其面积占四川地区总面积的 36.16%，而其城市数量却仅占了四川城市总数 17.88%。以城市分布的两级而言，成都府路的城市密度几乎为夔州路城市密度的 4 倍，两级分化明显。

⁵脱脱等撰：《宋史》卷 89《地理志》5，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7 册，第 2210—2234 页。

宋代四川城市的这一分布特征，是受其时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结果。城市的发展与人口和经济的聚集密不可分。因此，或可以从宋代四川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密度的角度一窥宋代四川城市的分布不均之成因。

宋代四川地区的人口分布是很不平衡的。现将宋代四川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列表如下：

表 5-3:宋代四川地区人口密度比较表

路别	年度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口数	每平方公里口数
成都府路	北宋崇宁元年（1102）	54,818.37	2,492,541	45.5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54,818.37	3,171,003	57.8
潼川府路	北宋崇宁元年	55,092.83	1,536,862	27.9
	南宋嘉定十六年	55,092.83	2,143,728	38.9
利州路	北宋崇宁元年	79,516.07	637,050	8.0
	南宋嘉定十六年	106,580.43	1,016,111	9.5
夔州路	北宋崇宁元年	107,310.88	468,067	4.4
	南宋嘉定十六年	107,310.88	279,989	2.6

资料来源：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本表中所采用的各路面积与人口资料均为包含宋代四川地区在内的川峡四路面积与人口资料。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北宋或南宋，成都府路与潼川府路的人口密度都远高于利州路和夔州路。其中，成都府路是四川地区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其人口数占了总人口数的40%至50%以上。其每平方公里人口为45至57人。它不仅是四川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潼川府路是宋代四川地区另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占了总人口数的30%左右，其人口密度在全国范围内也名列前茅，其北宋时期人口密度仅次于成都府路和两浙路，到南宋时期，其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东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两浙路，仅次于成都府路，成为宋代全国人口第二密集的区域。利州路和夔州路则人烟稀少，人口密度极低，就全国范围内比较，也是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宋代四川城市的分布密度基本是与人口的分布密度相一致的。

宋代四川地区人口与城市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所决定的。四川地区地域广大，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各区域的开发历史也不尽相同，导致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宋人已认识到四川地区内部发展水平的差异。楼钥诗云“益梓尚有繁盛风，夔峡穷民几比屋”说明在宋代人的眼中，成都府路与潼川路的繁荣程度远高于四川其它地区，而夔州路则是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正是成都府路与潼川路经济的发达，才能够赡养密度如此之高的人口，从而形成相对密集的城市群。

宋代四川地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经济开发的历史和程度不同而形成的。

在古代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³，每平方公里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取决于该区域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非常深远。宋人汪应辰对四川各区域的农业耕作条件是这样描述的：“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其潼川府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今来秋收微薄，米价渐贵，民已艰食。”“夔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年，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

³参见梁方仲先生对宋代各路人口密度的统计，载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楼钥：《送王粹中教授入蜀》，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34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5页。

又非潼川府路之比。”以上描述形象地指出了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之间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的明显的层次差别。成都府路地处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又有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比较稳定，水旱灾害也较少，自古以来就是四川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潼川府路地处盆地东部，多为丘陵地带，农业生产条件弱于成都府路。利州路位于川北，大部分是山区地带，农业生产条件不好，农业生产水平较为落后，所谓“地瘠财窘，虽丰年犹有艰食”⁴。气川陕四路中，以夔州路面积最大，自然环境也最为恶劣。其境尽在群山之中，所谓“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稼穡艰难，最为下下”，农业生产极为落后。从上述宋代四川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大致可以体现这样一个规律，即平原地区为经济发达地区，丘陵地带处于中间状态，而山地地区则往往为生产落后地区。这充分体现了自然地理因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此外，区域的交通条件也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一些地区虽然农业生产条件不佳，但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水陆交通便利，商业条件较为优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后文将有专门论述，此处便不再赘述。总之，四川地区区域间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宋代四川地区城市的分布的不平衡性，是与其时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吻合的，在物产丰饶的人口密集之地，城市分布也相对密集，而人口相对稀少、荒凉贫瘠的地区，城市分布则相对稀疏。处于成都平原的成都府路是四川地区城市分布较为集中，发展较好的地区，潼川府路相对较差，利州路、夔州路则更次之。除成都平原外，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城市的分布也较为集中。在宋代四川地区的陆路交通中，成都至长安的川陕干线仍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在水路交通中，岷江、嘉陵江和长江一线是当时最繁荣的水上通路。特别是随着宋代全国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南移，四川主要对外交通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四川地区与东南方向的联系明显增多，长江水路成为了四川地区通向东部的重要经济通道。这些都对宋代四川地区的城市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城市行政等级规模体系的变迁

宋代四川地区实施了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建置。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置西川路，开宝四年（971）分置陕西路，后两路合并为川陕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又改川陕路为益州路（宋仁宗嘉祐四年改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徽宗重和元年改为潼川府路）、利州路（南宋时曾数度分为东西两路，皆分而又合）、夔州路。这就是“四川”一名之由来，正如顾炎武所谓：“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宋代的州县根据其政治、经济地位和人口数量的差异分为了不同的等级。宋代的县，仍分作赤、畿、次赤、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 10 等。“次赤”“次畿”是指陪都，辅京所在的城池或郊区，望以下主要由户口数决定。北宋初年“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图之数，升降天下县，以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⁴。下面根据《宋史·地理志》中相关记载将宋代四川地区州县城市等级情况见表 5-4。

从表 5-4 可知，宋代四川地区共有 49 州，179 县，其中赤、畿、望、紧县为 61 县，占总数的 34.08%，上和中县为 51 县，占总数的 28.49%，中下和下县为 67 县，占总数的 37.43%。其中，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的县级城市等级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成都府路共 63 县，其中赤、畿、望、紧县占总数的 57.14%，上和中县占总数的 22.22%，中下和下县占总数的 20.63%。

⁴汪应辰撰：《文定集》卷四《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1986）·文定集（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31 页。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84《利州路》，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731 页。

度正：《性善堂稿》卷 6《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性善堂稿卷六，第 14 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684 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 158《选举志》4，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1 册，第 3695—3696 页。

潼川府路共 54 县，其中赤、畿、望、紧县占总数的 33.33%，上和中县占总数的 37.04%，中下和下县占总数的 27.78%。

表5-4: 宋代四川城市等级分布表											
路名	府州	府州级	次赤	次畿	望	紧	上	中	中下	下	合计
成都府路	成都府	次府	2	7							9
	眉州	上			3	1					4
	蜀州(崇庆府)	紧			5						5
	彭州	紧			4						4
	绵州	上			2	2		1			5
	汉州	上			4						4
	嘉州(嘉定府)	上					2	2		1	5
	邛州	上			4		1	1			6
	黎州	上								1	1
	雅州	上					1	2	2		5
	茂州	上								2	2
	简州	下					1	1			2
	威州	下								2	2
	仙井监(陵州)	下							1	3	4
	永康军	下			2						2
	石泉军						2			1	3
合计	16府州		2	7	24	3	7	7	3	10	63
潼川府路	潼川府(梓州)	紧			3	2	1	2	2		10
	遂州	都督府			2	2		1			5
	顺庆府(果州)	中			3						3
	资州	上				2			1	1	4
	普州	上						1	1	1	3
	昌州	上					3				3
	叙州(戎州)	上						2		2	4
	泸州	上						3			3
	长宁军										1
	合州	中						3	2		5
	荣州	下						2	2		4
	渠州	下				1				2	3
	怀安军	下			2						2
	宁西军(广安军)	下				1		2		1	4
	富临监	下									1
合计	15府州				10	8	4	16	8	7	54
利州路	利州	都督府						2	1	1	4
	阆州	上			1	3		2	1		7
	隆庆府(剑州)	上						1	3	2	6
	巴州	中					1		2	2	5
	蓬州	下			1			3	2		6
	政州(龙州)	下						1		1	2
合计	6府州				2	3	1	9	9	6	30

路名	府州	府州级	次赤	次畿	望	紧	上	中	中下	下	合计
夔州路	夔州	都督府						1	1		2
	绍庆府(黔州)	下						1		1	2
	达州	上						2		4	6
	咸淳府(忠州)	下							2	3	5
	万州	下								2	2
	开州	下					1	1			2
	涪州	下								3	3
	重庆府(恭州)	下						1	1	1	3
	云安军	下			1						1
	梁山军	下			1				1	1	3
	南平军	下							1	1	2
	大宁监	下							1		1
合计	12府州军监				2		1	6	7	16	32
总计	49府州军监		2	7	38	14	13	38	27	39	179

资料来源：《宋史》卷89《地理志》5。

利州路共 30 县，其中赤、畿、望、紧县占总数的 16.67%，上和中县占总数的 33.33%，中下和下县占总数的 50%。

夔州路共 32 县，其中赤、畿、望、紧县占总数的 1.95%，上和中县占总数的 21.88%，中下和下县占总数的 71.88%。

从以上数据统计可以看出，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不仅城市密度大，而且城市的规模等级也高于利州路和夔州路。夔州路不仅城市数量少，而且城市的规模等级也很低，中下和下县在夔州府路的城市数量中占据了高达 71.88%。宋代四川地区城市分布的不平衡性在此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此外，各路区域内城市分布也存在地域差异。以成都府路为例。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成都府路内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地区，而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茂州、威州、黎州等州县的规模等级却是比较低的。总体而言，四川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农业和交通条件较好的腹心区域，其它区域的城市规模一般较小。

再将宋代四川地区城市规模体系与唐代相对比。宋代的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大致可以和唐代的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山南东道和黔中道相对应。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宋代成都府路城市在四川城市规模体系中的地位实际已发生了变化。虽然成都府路城市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仍居首位，但成都府路城市中具有赤、畿、望、紧及上和中县地位的城市在四川城市中级以上县中所占的比例已从唐代的 41.76%下降为宋代的 32.14%。潼川府路中中级以上县在四川城市中级以上县中所占的比例则从唐代的 29.41%上升到了宋代的 33.93%。夔州路中中级以上县在四川城市中级以上县中所占的比例也从唐代的 2.94%上升到了宋代的 8.23%。\$这种情况表明，宋代四川地区城市分布格局在唐代的基础上已经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成都平原仍然是四川城市分布与发展的中心，但随着四川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开发，经济的日趋繁荣，四川城市分布重心也逐渐呈现向东和向南慢慢转移的趋势。有宋一代，这种趋势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从宋代四川人口分布的变化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根据贾大泉先生的统计，成都府路人口在四路中所占的比重，到南宋时已由北宋时的 50%降至 40%左右，潼川府路南宋时期所占比例比北宋时略有提高，利州路和夔州路所占比重则从北宋时的 10%左右增加到了 15%左右。反映出南宋时期四川地区人口逐渐向经济基础、自然条件较差的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与四川城市分布的变迁轨迹也是基本相符的。除了交通的变迁以及区域经济开发的演进带来人口分布的变化外，有学者还认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成都府路人口增长速度在宋代的放慢是由于该区域的人口数量已达到饱和，人地矛盾尖锐所致。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共同作用，带来了宋代四川城市规模体系与分布格局的变迁。

三、商税与商业中心城市的分布

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商业贸易十分繁荣，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商业在宋代城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商业贸易尤为繁荣的四川地区尤为突出。宋代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城市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四川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已远胜于前代，城市作为商业中心的经济功能得到了不断增强。商业对宋代四川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规模等级和分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较为系统、完整、独立的商税统计的时期，体现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宋代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商税的征收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一般而言，商税收入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相应区域的商业发展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商税主要在城市征收，因此与城市的社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下文即欲从分析宋代四川地区商税征收的角度入手，探究宋代四川地区城市商业的发展，以及商税与城市的规模等级和分布之间的关系。

宋代十分重视商税的征管，在州县设置收税机构，“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⁵。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当时四川地区的绝大多数州县城市都设置了商税务。现存有关宋代商税统计的记载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散见于各种宋代史籍中的商税总额和个别州、县之额。另外一种则是记载于《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辑稿补编》中的商税细帐，对“旧额”时期和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京及23路的各府、州、县、镇、津渡等场务的商税数目分别进行了统计。其中，“旧额”虽然也涉及到了四京及23路的商税数，但它却没有熙宁十年那么详细，如“旧额”只详细到各州的商税额，而无具体的各县及各津渡、场务之额；熙宁十年(1077)之统计则不同，它不仅各有各州的在城额，而且还有各县、镇、津渡、场务等之额。因此，学界有关宋代商税籍帐的研究多侧重于熙宁年间之统计。本文也欲以熙宁年间之统计资料为主来分析宋代四川地区之商税与城市发展问题。

关于熙宁年间四川地区商税统计问题，前人已有一些整理与研究。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四川地区商税额统计中的币值换算问题。在《宋会要辑稿》及《补编》中载录的商税额中，分为铜钱和铁钱两种货币统计方式。这主要是与宋代各地流通的币种不同有关。宋代，四川为铁钱流通区，西北为铜、铁钱并行区域，其它各路大体上为铜钱流通区。《宋会要辑稿·食货》中载：“凡成都府、利、夔、梓四路并铁钱。”由此引起的便是将川陕四路商税铁钱收入额换算为铜钱时的比价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颇有争议，加藤繁、蒙文通、郭正忠、林文勋、贾大泉、李景寿等诸位先生都曾分别对此作了考述。本文中所使用的有关商税额的统计正是在参考了各位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整理所得。

为便于分析研究，现将宋代四川地区有关商税额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 5-5:宋代四川地区商税额统计一览表

路名	州名	州			县		场镇	
		旧额 (贯·分·文)	熙宁十年额 (贯·分·文)	熙宁十年在城额 (贯·分·文)	县数	各县总和 (贯·分·文)	场镇数	各场镇总和 (贯·分·文)
成都府路	成都府	899300	171635.559.1	67508.059.4	7	101051.888.17	2	3075.610
	眉州	127100	38835.618.9	38422.778.9		无	1	412.840
	蜀州	2119910	74623.578.1	18492.011	4	45522.123.16	5	10609.441.15
	彭州	277857	96325.898.8	30196.170.5	1	26431.315	9	39698.411.23
	绵州	126375	69477.495	54376.966	7	12653.072	1	2447.457

⁵唐代四川地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参见李映涛：《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 第3期。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7页。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186《食货志》下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册，第4541页

	汉州	170486	78617.403	48399.129	3	30218.274		无
	嘉州	116121	39885.961	32923.812		无	2	6962.149
	邛州	124070	64403.096	37459.844	2	8713.607	6	18229.645
	黎州	21318	3150.196	3150.196		无		无
	雅州	32036	36027.897	13286.598		无	5	27741.299
	茂州	1400	147.777	无		无	1	147.777
	简州	129150	33215.496.1	30128.970	2	3086.526.1		无
	威州	不立额	不立额	不立额		不立额		不立额
	陵井监	8975	19468.282	16549.605		无	1	2918.677
	永康军	209370	今废	今废		今废		今废
	十五州军监合计	2463468	725814.258	390894.138.18	26	227676.805.34	33	107243.306.38
潼川府路	梓州	274046	64277.700	55078.049		无	9	91199.651
	遂州	280676	50147.376	48438.224		无	1	1709.152
	果州	148188	32478.789	32478.789		无		无
	资州	92677	21389.764	21389.764		无		无
	普州	68321	18356.891	17864.114		无	2	492.777
	昌州	51057	11745.519	11456.285	2	289.234		无
	戎州	103245	14210.120	13410.120		无	2	800.000
	泸州	113293	21631.840	20501.840	1	50.000	1	1080.000
	合州	137206	37597.400	37597.400		无		无
	荣州	47347	8771.400	7417.295	3	1354.105		无
	渠州	53221	15563.033	15563.033		无		无
	怀安军	181488	24137.958	21148.120	1	651.575	1	2338.263
	广安军	42786	18258.279	17554.539	2	703.740		无
	富顺监	44349	9788.541	9788.541		无		无
	十四州军监合计	1637900	348354.610	32986.113	8	3048.654	16	15619.843
利州路	利州	134563	48940.159	43051.702	3	5888.457		无
	阆州	150165	26232.268	25741.512	6	490.756		无
	剑州	106204	53046.230	18594.500	5	26502.978	1	7948.752
	巴州	37104	14085.745	5561.945	4	8352.277	1	171.523
	蓬州	30651	6811.919	4686.913	3	2125.006		无
	龙州	16292	19934.347	14527.026	1	5407.321		无
	六府州县合计	190251	169050.668	57578.728	22	11295.778	2	8120.275
夔州路	夔州	132331	35443.537	21292.999	1	14150.538		无
	黔州	41396	12924.358	10185.307	1	977.630	3	1761.421
	达州	69803	21388.431.7	19719.867.7	4	1668.564		无
	忠州	45932	18986.288	14420.926	3	3804.570	1	760.792
	万州	42112	17075.960	17062.880	1	13.080		无
	开州	23264	7369.564	5834.970		无	1	1534.594

涪州	71320	34887.435	28385.456	1	2329.045	3	4172.934
渝州	48365	39162.690	31615.977	2	7546.713		无
云安军	43071	18537.219	17836.068	1	701.151		无
梁山军	6742	2517.797.6	2517.797.6		无		无
南平军	旧无此军	3448.920	1433.927	2	2014.993		无
大宁监	73933	12939.843	12939.843		无		无
十二州军 监合计	598269	224682.043.3	183246.017.13	16	33206.284	8	8229.741

资料来源：1、《宋会要辑稿》食货 16 之 15—— 16 之 20。

2、 由于本表只对四川地区内商税额作统计，故本表中有关商税额数全以铁钱额统计。

3、 本表中所指之县数为《宋会要辑稿》中所载有税额之县数。

表 5-6:熙宁十年（1077 年）宋代四川州县城市商税统计表

路名	州名	州城商税额（贯•分•文）	县名	县商税额（贯•分•文）
成都府路	成都府	67508.059.4	温江县	9229.986.4
			郫县	15307.209.7
			灵泉县	6941.703
			新繁县	15197.443.1
			双流县	14920.103.5
			广都县	22531.705
			新都县	16923.679
	眉州	38422.778.9		
	蜀州	18492.011	江源县	8249.118
			永康县	11819.92.7
			新津县	12530.971
			青城县	12922.942.9
	彭州	30196.170.5	导江县	26431.315
	绵州		彰明县	2020.105
			魏城县	2299.216
			罗江县	2223.344
		54376.966	神泉县	1439.31
			龙安县	4031.753
			盐泉县	492.847
			石泉县	146.776
	汉州	48399.129	德阳县	12774.617
			什邡县	9460.956
			绵竹县	8036.721
	嘉州	32923.812		
	邛州	37459.844	火井县	7167.458
			浦江县	1546.149

	黎州	3150.196		
	雅州	13286.598		
	茂州	无		
	简州	30128.970	平泉县	2768.891.1
			江南县	317.636
	威州	不立额		
	陵井监	16549.605		
	永康军	今废		
潼川府路	梓州	55078.049		
	遂州	48438.224		
	果州	32478.789		
	资州	21389.764		
	普州	17864.114		
	昌州	11456.285	昌元县	134.400
			永川县	150.834
	戎州	13410.120		
	泸州	20501.840	合江县	50
	合州	37597.400		
	荣州	7417.295	威远县	302.557
			资官县	427.874
			应灵县	623.674
	渠州	15563.033		
	怀安军	21148.120	金堂县	651.575
	广安军	17554.539	岳池县	193.850
			新明县	509.890
	富顺监	9788.541		
	利州	43051.702	葭萌县	1531.831
			嘉州县	1906.269
			昭化县	2450.357
利州路	阆州	25741.512	新井县	149.611
			苍溪县	128.811
			西水县	50.964
			新政县	72.39
			奉国县	66.251
			南部县	23.80
	剑州	18594.500	梓潼县	18514.512
			阴平县	4743.533
			武连县	1306.60
			普成县	1746.188
			普安县	192.685
	巴州	5561.945	恩阳县	167.848
			曾口县	296.837

	蓬州	4686.913	通江县	4878.489
			南江县	3912
			仪陇县	929.878
			营山县	642.456
			伏虞县	552.672
			清川县	5407.321
夔州路	夔州	21292.999	巫山县	14150.538
	黔州	10185.307	黔江县	977.630
	达州	19719.867.7	永睦县	254.772
			新宁县	447.893
			东乡县	579.190
			巴渠县	386.709
	忠州	14420.926	丰都县	748.996
			垫江县	2668.614
			南宾县	386.960
	万州	17062.880	武宁县	13.80
	开州	5834.970		
	涪州	28385.456	乐温县	2329.45
	渝州	31615.977	江津县	5995.493
			璧山县	1551.220
	云安军	17836.068	云安县	701.51
	梁山军	2517.797.6		
	南平军	1433.927	南平县	1258.581
			隆化县	756.412
	大宁监	12939.843		

通过对以上两表的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熙宁十年四川各路的商税收入总计为 1467901.5793 贯，其中州县城市数额为 939932.51765 贯，占了总数的 64%，而各镇、津渡、场务数额为 527969.06165 贯，占总数的 36%，亦即是绝大部分的商品量是集中在州县城市的市场上进行流通和交易的。这充分说明宋代四川各级城市已不同程度地成为沟通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枢纽，是商业活动的中心。商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体现出宋代四川城市作为商业中心的经济功能得到了不断增强，城市已不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政治中心。

第二、熙宁十年四川各路府州级城市的商税总收入为 664704.99631 贯，县级城市的商税总收入 308433.80534 贯，府州级城市的商税总收入是县级城市商税总收入的 2.16 倍。此外，在同一州的范围内，州城的商税额往往要远高于县城。这说明宋代四川城市的经济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其行政等级地位的影响甚大，大致呈现出一种按行政级别的大小顺序排列的状况。不过，从整个四川地区范围来看，一些落后地区的州城的商税额却往往低于发达地区的县城商税额。如成都府路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黎州城商税收入仅为 3150.196 贯，而同处于成都府路的位于成都平原的郫县的商税收入则高达 15307.209.7 贯。

第三、熙宁十年四川各路的商税收入总计为 1467901.5793 贯，按 1.5:1 的比率折算为铜钱为 978601.0529 贯，占全国商税总收入的 12.83%；州县城市商税收入为 939932.51765 贯，折算为铜钱为 626621.6784 贯，占全国州县城市商税总收入的 10.73%。

以上统计充分说明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四川城市商业发展水平也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第四、在宋代四川地区商税额统计中，仍然体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首先，从宋代四川四路的商税总额来看。熙宁十年（1077）成都府路的商税总额为 72 万余贯，远高于其他地区，列第一位；潼川府路为 34 万余贯，列第二位；夔州路为 22 万余贯，列第三位；利州路为 16 万余贯，列最末位。其次，从各不同商税额等级的城市的分布看，区域性也很明显。关于宋代商税额与城市的等级划分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标准。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征榷考》中按其商税收入的多寡划分为八等城市。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后续性的研究工作。其中，又以李景寿在其《宋代商税问题研究》4 一书中的划分方法较为详尽。本文拟参考李景寿先生的划分标准，将宋代四川地区城市按其商税收入高低为标准划分为不同等级来进行分析研究。为便于分析，兹将宋代四川州县城市按不同商税额等级整理、统计如下表（熙宁十年四川州县城市商税等级表）。从表中统计分析可知：在成都府路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中，一等城市占 5.4%，二等城市占 16.2%，三等城市占 35.1%，四等城市占 16.2%，五等城市占 18.9%，六等城市占 8.2%。在潼川府路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中，一等城市占 4.3%，二等城市占 13%，三等城市占 34.8%，四等城市占 8.6%，五等城市缺失，六等城市占 39.3%。在利州路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中，一等城市缺失，二等城市占 3.6%，三等城市占 14.3%，四等城市占 7.2%，五等城市占 32.1%，六等城市占 42.8%。在夔州路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中，一等城市缺失，二等城市占 3.6%，三等城市占 32.1%，四等城市占 7.2%，五等城市占 21.4%，六等城市占 35.7%。在成都府路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体系中，较高等级城市所占比例要高于其他地区。在利州路和夔州路中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体系中，则以较低等级的城市为主。

表 5-7:熙宁十年（1077）四川州县城市商税等级表

路\等级	一等 (5~10 万贯)		二等 (3~5 万贯)				四等 (5000~1 万贯)		五等 (1000~5000 贯)		六等 (10001 贯以下)	等
	州城	县城	州城	县城	州城	县城	州城	县城	州城	县城	州城	县城
成都府路	成都府		眉州		蜀州	郫县		温江县	黎州	彰明县		盐泉县
	绵州		彭州		雅州	新繁县		灵泉县		魏城县		石泉县
			汉州		陵井监	双流县		江源县		罗江县		江南县
			嘉州			广都县		什部县		神泉县		
			邛州			新都县		绵竹县		龙安县		
			简州			永康县		火井县		浦江县		
						新津县				平泉县		
						青城县						
						导江县						
						德阳县						
总计	2	0	6	0	3	10	0	6	0	7	0	3
潼川府路	梓州		遂州		资州		荣州					昌元县
			果州		普州		富顺监					永川县
			合州		昌州							合江县
					戎州							威远县
					泸州							资官县
					渠州							应灵县
					怀安军							金堂县
					广安军							岳池县
												新明县
总计	1	0	3	0	8	0	2	0	0	0	0	9
利州路			利州		阆州	梓潼县	巴州	清川县	蓬州	葭萌县		新井县

					剑州					嘉州		苍溪县
					龙州					昭化县		西水县
										武连县		新政县
										普成县		奉国县
										阴平县		南部县
										通江县		普安县
										难江县		恩阳县
												曾口县
												仪陇县
												营山县
												伏虞县
总计	0	0	1	0	3	1	1	1	1	8	0	12
夔州路			渝州		夔州	巫山县	开州	江津县	梁山军	垫江县		黔江县
					黔州				南平军	乐温县		永睦县
					达州					璧山县		新宁县
					忠州					南平县		东乡县
					万州							巴渠县
					涪州							丰都县
					云安军							南宾县
					大宁监							武宁县
												云安县
												隆化县
总计	0	0	1	0	8	1	1	1	2	4	0	10

如前所述，宋代四川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已远胜于前代，城市作为商业中心的经济功能得到了不断增强。随着宋代四川城市商业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商业中心城市。从前文中所统计的宋代四川州县城市的商税额中可以看出，一些城市的商税额远高于其它城市，成为了区域贸易中心。同时，这些商业中心城市的分布又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下面暂且以熙宁十年三等以上商税等级的四川州县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其分布空间特征。

下图主要根据前文所统计之《熙宁十年（1077）四川州县城市商税等级表》与《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中第 17 幅《北宋行政区划》而制作。图中主要选取了熙宁十年（1077）四川州县城市商税等级中列前三等的城市，根据商税等级的不同将各城市以不同大小的圆点标示于《北宋行政区划》地图中的相应位置上。

图5-1：宋代巴蜀地区重要商业城市地域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宋代四川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的空间分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这些重要商业城市在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区域有成片分布的特征。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成都平原上及其附近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团聚着彭州、汉州、简州、眉州、嘉州、邛州等六州，它们与成都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等级城市群。绵州与梓州也与这个城市群相距较近，大致可以看作同一系统。这样，这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系统就拥有了宋代四川地区城市商税等级中的所有的一等城市和 54% 的二等城市。此城市群在四川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这种相对发达的城市群的形成与其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密不可分的。成都平原，自然条件极为优越，有良好的灌溉条件，耕作条件极好，“蜀地险隘，一多饶少衍，侧耕危获，田事孔难。惟成都、彭、汉，平原沃壤，桑麻满野”^①农业生产较为发达。这些都为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区域成为宋代四川地区商业城市分布较集中，发展较好的地区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些重要商业城市还呈现出沿主要水陆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宋代四川地区的交通环境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州县间已有驿路相通，沿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长江等江河的水运也开展起来，城市之间的网络交通道路更为畅通，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四川商业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对外交通方面，则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周的交通系统。在宋代四川地区的对外交通中，以由岷江、嘉陵江入长江东下的水路和由成都北上至陕西的陆路交通最为重要，正如欧阳修在《峡州至喜亭记》所描述的“贡输商旅之往来者，陆攀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由成都通往陕西的陆路干线主要有两条。其一是从成都出发，经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至汉中，是为南栈道，又名官道。其二则是由成都经梓州、阆州、巴州翻越米仓山而到达汉中的米仓道。从汉中再向外延伸，可远至汴京。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上封者言：‘西川往来商旅，有公凭者，则由剑门经过。无者，并自阆州往来。盖自利州入阆州，由葭萌寨，并有私路入川。乞今葭萌寨依剑州置关，委本寨使臣，验认公凭放往来。’”^②从之”^③气说明当时两道均为四川通往陕西的重要交通路线。

由于蜀道艰难，运输费用较高，因此，水路运输在宋代四川的对外交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宋代以来，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开封，特别是经济重心的南移，四川主要对外交通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与东南方向的联系明显增多，往东方向的长江水路成为了当时最为繁荣的水运交通路线。岷江、长江水系，是当时四川地区的水路交通动脉。早在宋代以前，沿岷江、长江而下的水道，就是四川与东南地区商品流通与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宋代这条水道的运输贸易空前繁荣，自成都出发，“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气四川地区输送中央的财帛，主要通过岷江、长江水道，再由湖北转运开封。史载：“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

嘉陵江水道，是宋代四川地区通往境外的另一条重要水运交通路线。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山地，由北向南横贯川北地区，流经利州、阆州、果州、合州，至渝州与长江会合。发源于岷山南麓的涪江，则流经绵州、梓州、遂州，至合州而与嘉陵江会合，因此可以看作嘉陵江的支流。这样，沿嘉陵江水路，逆江而上可到达陕西的凤州等地，顺流而下则可至荆南。宋代这条水路曾担负着转运茶纲入秦州，漕运军粮入兴、凤州和转输马纲至荆南的重担，即“马纲商贩之舟溯嘉陵而上，马纲顺流而下”。

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要道又相互交汇，构成了宋代四川城市间物资往来的交通网。宋代四川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大多都位于这张交通网中的主要交通枢纽上。

从下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各主要水陆交通线上的重要商业城市分布：

从成都出发，经金牛道至陕西：成都府（一等）、汉州（二等）、绵州（一等）、剑州（三等）、利州（三等）。

从成都出发，经米仓道至陕西：成都府（一等）、梓州（一等）、阆州（三等）。

岷江水路沿岸：青神（三等）、彭州（二等）、成都府（一等）、眉州（二等）、嘉州（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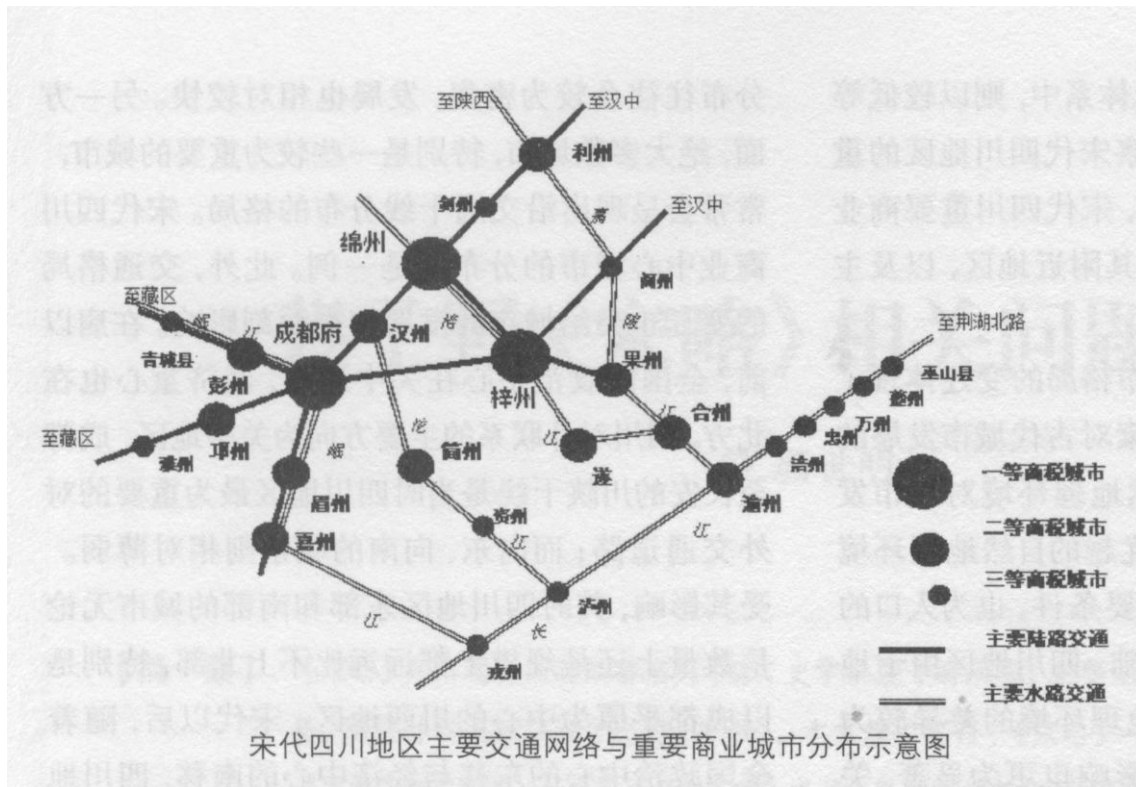
嘉陵江水路沿岸：利州（二等）、阆州（三等）、果州（二等）、合州（二等）、绵州（一等）、梓州（一等）、遂州（二等）。

长江水路沿岸：巫山县（三等）、夔州（三等）、万州（三等）、忠州（三等）、涪州（三等）、渝州（二等）、泸州（三等）、戎州（三等）。

沱江水路沿岸：汉州（二等）、简州（三等）、资州（二等）。

所有的一、二等级的商业城市都分布在主要的交通路线上，除彭州、邛州和渝州以外，其他所有的一、二等级的商业城市都同时具有水陆交通优势，而且其中所有的第一等级城市均位于重要的交通要冲上（交叉点）。成都府城则处于这个交通网络的辐射中心，几乎所有的重要商路皆以成都府城为指向。此外，川东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商业城市都位于长江沿线，这或许与该地区腹地农业落后，商业城市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对外交通的发展有关。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渝州则是长江沿岸城市中最重要商业中心城市。

总之，宋代四川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以及主要水陆交通干线上。成都府城不仅位于成都平原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而且处于四川地区水路交通网络的核心，具有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区位优势性，因此成为了四川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结语

宋代是四川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城市数量较隋唐五代时期有较大减少，其原因主要是宋代州县的设置与裁撤更多地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户口多寡相关联，一些在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在一些本身开发程度并不高的地区所设置的州县多被裁撤。从这个角度看，宋代四川州县城市的设置应该较之前代更能反映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行政区划的合理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四川共设有 49 州、179 县，从城市数量而言，与今日差距不大，亦或可以从侧面反映其相对合理性。受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四川城市的发展分布呈现出不平衡性。具体就宋代四川城市的分布密度而言，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以占四川地区 37.04% 的面积却拥有了宋代四川 65.36% 的城市数量；面积占四川地区总面积的 36.16% 的夔州路，其城市数量却仅占了宋代四川城市总数 17.88%。成都府路的城市密度几乎为夔州路城市密度的 4 倍，两级分化明显。宋代四川城市发展与分布的不平衡也体现在城市等级规模体系中。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不仅城市密度大，而且城市的规模等级也高于利州路和夔州路。夔州路不仅城市数量少，而且城市的规模等级也很低，中下和下县在夔州府路的城市数量中占据了高达 71.88% 的比例。另一方面，与唐代相比，虽然宋代成都府路城市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仍居首位，但成都府路城市中具有赤、畿、望、紧及上和中县地位的城市在四川城市中级以上县中所占的比例已从唐代的 41.76% 下降为宋代的 32.14%。潼川府路中中级以上县在四川城市中级以上县中所占的比例则从唐代的 29.41% 上升到了宋代的 33.93%。夔州路中中级以上县在四川城市中级以上县中所占的比例也从唐代的 2.94% 上升到了宋代的 8.23%。这表明随着宋代四川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开发、经济的日趋繁荣，四川城市分布重心也逐渐呈现向东和向南慢慢转移的趋势。宋代四川城市分布的不均衡性也体系在宋代四川商业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中。宋代四川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已远胜于前代，城市作为商业中心的经济功能得到了不断增强。商业对宋代四川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规模等级和分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能密切体现商业发展水平的商税收入入手，或可以进一步探究宋代四川城市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规模等级和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从宋代四川商税额统计看，在成都府路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体系中，较高等级城市所占比例要高于其他地区。在利州路和夔州路中州县城市商税额等级体系中，则以较低等级的城市为主。再进一步考察宋代四川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的空间分布可知，宋代四川重要商业城市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以及主要水陆交通干线上。

宋代四川城市体系与分布格局的变迁体现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交通因素对古代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古代社会，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发展与分布的影响尤为突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成长提供了基础。四川地区由于地貌的多样性，各区域间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较为明显，对城市发展与分布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关于这点在前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复述。总体而言，那些耕作条件与气候环境相对优越的平原和河谷盆地地区城市的开发历史较为悠久，城市的分布也相对集中。特别是富饶的成都平原，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城市发展历史悠久，一直以来都是四川地区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广阔的西部高原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发展落后，因而城市发展落后，城市分布也非常稀疏。此外，交通条件对于城市的分布与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一些交通便捷的区域，城市的分布往往会较为密集，发展也相对较快。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城市，特别是一些较为重要的城市，常常会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格局。宋代四川商业中心城市分布即是一例。此外，交通格局的变迁也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唐以前，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地区，经济重心也在北方。四川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向为关中地区，成都至长安的川陕干线是当时四川地区最为重要的对外交通道路；而向东、向南的联系则相对薄弱。受其影响，其时四川地区东部和南部的城市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比不上北部，特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宋代以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与经济中心的南移，四川地区的主要对外交通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与东南方向的联系明显增多。四川地区东南部的城市由此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四川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与之相对的是西部，特别是北部的一些在唐宋时期地位颇为重要的城市的地位却明显下降。总之，宋代四川城市体系与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不仅是宋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后世乃至今日四川城市的分布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